

蜀道文化

马强 著

与历史人物研究

SHUDAO WENHUA YU LISHI RENWU YANJIU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西出阳关，东入秦川。千里关山，万里风尘。宋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切莫悲死，程未雪，臣言恨。何时减驾，七车踏。破贺崇山，转壮未。饥餐于露肉，笑谈渴。饮血，双血，结。收于高山，月。无。岳九行，何。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蜀道文化

与历史人物研究

SHUDAO WENHUA YU LISHI RENWU YANJIU

马强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蜀道文化与历史人物研究 / 马强 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1

ISBN 978 - 7 - 207 - 11648 - 2

I. ①蜀… II. ①马… III. ①蜀道—文化研究 ②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K928.6 ②K8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19057 号

责任编辑:姚虹云

封面设计:张涛

蜀道文化与历史人物研究

马强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圣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58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11648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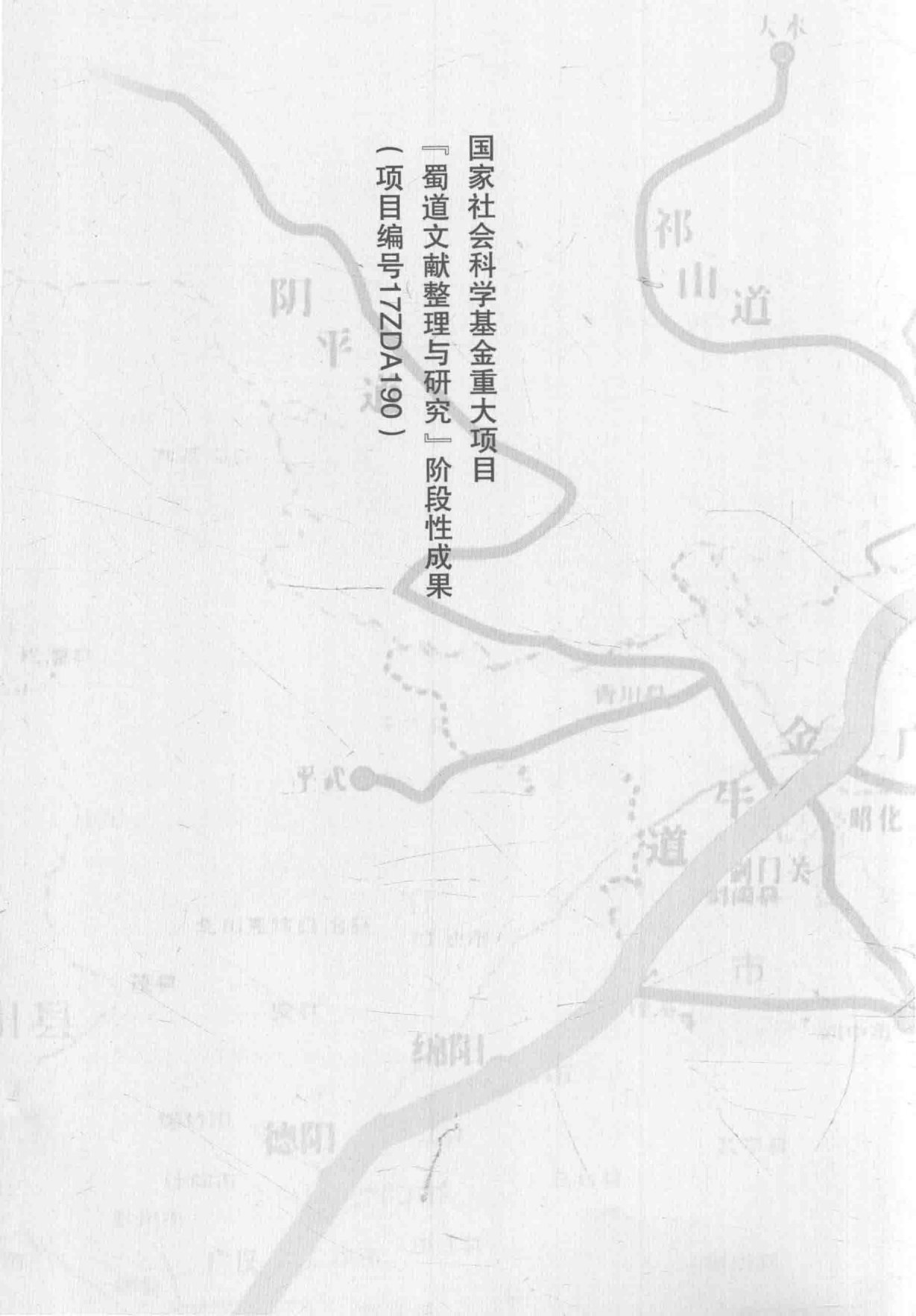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82308054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蜀道文献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17ZDA190)



序 言

本书的内容,主要是我在区域历史文化(主要以蜀道与秦巴山地历史文化为主)与历史人物研究两个领域的文章汇集,包括应邀为学界朋友著作撰写的序言与评论。因近年我在历史美学、历史地理及出土石刻文献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分别收入二书《历史审美与历史地理论集》和《出土唐宋石刻文献与中古社会》(均由巴蜀书社2018年7月出版),《蜀道文化与历史人物研究》则是另外一些领域的研究成果。从一定意义上说,《蜀道文化与历史人物研究》的出版是我多年来辛勤耕耘于边地田野秋收的一个标志。

本书上编主要以蜀道及秦巴山地历史文化为主,实则有一部分已经溢出这一范围涉及稍远,包括部分武陵山区、乌江流域、赤水河流域甚至客家文化的研究,但只是少量,绝大部分仍然是围绕蜀道地带与秦巴山地展开探讨的。蜀道与汉水上游秦巴山地的历史文化、历史地理是我多年来一直钟情并用力较多的重点区域。之所以对这一区域萦绕、留恋者三,并不仅仅因为这里是生我养我的桑梓之地,更是基于这片热土特殊的历史地理区位、地位和千百年来历史在这里的神奇演进。我的史学研究始于宋史(详见拙著《历史审美与历史地理论集·后记》),却落脚于历史地理。近几年来由于承担国家社科项目“出土唐人墓志历史地理资料整理与研究”,花费在唐人墓志与唐史文献方面的时间较多,但多年来的研究仍然以区域为主。实践证明,对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仅仅囿于一两个断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打通考察才能对一个区域的历史地理、历史文化发展的源头、过程、特点、规律有全面的认知。本书所收《论早期汉水上游与渭水流域的关系及意义》及《早期巴人的起源与迁徙新论》就是对汉水上游上

古历史地理与文化的一点粗浅探讨,也是对将区域研究的时间追溯至上古时期的尝试。前者是在2002年应邀在陕西宝鸡参加“炎帝与汉民族”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交流论文,时日已久,辗转数地,以至于早已筐中无存,不得已远程求援于陕西宝鸡学界耆宿霍彦儒先生才“失而复得”;后者是2017年应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何易展院长盛情约稿而写,也算是多年来对巴人、巴文化起源地的一些独自思考的成文。我深知巴人、巴文化的起源时间、空间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是歧义纷出、各执一端而相持不下的“雷区”,却也知难而进。文中力主汉水上游说,试图利用文献学与考古发现的“二重证据”方法重新梳理这一疑难问题,以求贡献一孔之见。

地处汉水上游的汉中盆地历史上农业经济开发很早,也是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与成都平原相颀颀的两个“天府之国”之一。但对汉中农业史的研究却一直十分薄弱,汉中本土学者除了前汉中市文管会陈显远先生、汉中农校薄吾成先生等作过一些开拓性研究外,尚无系统、全面的通史性专文问世。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汉中师范学院(现陕西理工大学)工作时曾经申请到一个陕西省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资助项目“汉中盆地历史地理研究”,从历史农业地理角度对汉中盆地的农业发展、经济环境变迁等作过较系统的考察,后来发表两篇论文,即收集于本书中的《早期汉中盆地农业经济的开发》和《论宋元至明清汉中盆地农业经济的发展》。虽然只是两篇论文,但却比较系统,通过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互为印证的方法基本复原、厘清了从先秦至明清汉中盆地农业发展的过程、脉络和阶段性特点,算是对桑梓之地汉中这一古老农业区历史农业发展变迁问题作了一个交代。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南京农业大学的《中国农史》与厦门大学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曾经受到一些农史学者的关注与好评,当然也曾经被某个农业科技大学的农史“学者”巧妙抄袭剽窃。

笔者对蜀道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刚刚大学毕业不久,先是在中学教书,后调入一地方大学执教。正在寻求茫茫史海舟楫方向时,恰逢1988年春汉中举办“褒斜道与石门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我第一次作为青年学者受到邀请,得以忝列盛会,目睹学界诸大家的神采风范,亲炙师长教诲,虽然只是应郭荣章先生嘱托写了一篇有关建国以来“褒斜道与石门石刻”的综述文章,但幸运地被收入会议论文集,后经改写刊登于《成都大学学报》。认识到汉中是栈道之乡、蜀道枢纽,又开始关注并探讨蜀道历史文化,经过几年积累,

陆续发表了一批蜀道研究文章,后来读博时结集出版的第一部书就是《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近年来随着蜀道“申遗”与蜀道沿线旅游产业开发的逐渐升温,蜀道研究也走向繁荣,川、陕、甘等地相关学术研讨会也多了起来。同时,蜀道历史文化及其历史文献也成为更多学者与国家科研管理部门的重视对象,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指南中有“蜀道文献整理与研究”选题,经过国内数个高校及社科院的激烈竞争,最终幸运落户西南大学,由我负责主持,表明国家最高社科管理层对蜀道及其文献的重视。本书收录的《蜀道文化述论》《论蜀道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现状与拓展》《蜀道及嘉陵江流域地方文献的特征和意义》《蜀道线旅游资源的开发》等,有的是旧稿增修,有的则是新近完成。其中《论蜀道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现状和拓展》是我作为首席专家主持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蜀道文献整理与研究”伊始对蜀道文献研究现状的批评与研究主旨及基本构想。

此外,在上编“区域历史文化研究篇”中还收录几篇研究黔中文化、客家文化的文章,这里也略作说明。黔中文化是近年来湖南、贵州、重庆一些地处武陵山地区地市十分重视的研究课题,曾经多次邀请国内学者召开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集,影响也从微而著,日益扩大。本书收录的两篇讨论黔中文化与历史地理的文章虽然皆为“应会”而作,但也反映了笔者对武陵山地区区域文化的兴趣和基本观点。黔中文化与蜀道文化、巴渝文化在地域与内涵上有一定关联,但自成特色。武陵山地区作为中国历史上地处川、渝、黔、湘、鄂之间一个神秘的封闭地带,地貌复杂,生态繁复,汉夷混杂,交通闭塞,风俗奇异,现在主要为苗族、土家族、侗族等民族居住区。从学术研究而言,武陵山区历史地理研究空白甚多,尚属有待开发的处女地。收入本书的《关于黔中文化研究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论唐宋黔中诗的历史地理意象及其意义》,算是对古代“黔中”地区历史地理的一点初步探讨。

本书下编是我对几个历史人物研究论文的汇编,历时较长,其中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82年《读书》杂志,最晚的一篇撰写于2018年夏天。历史人物的研究本来是历史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内容,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也多次围绕历史人物展开过激烈的讨论争鸣,很多人对历史的兴趣也是从历史人物传记的阅读开始。但近几十年学界历史人物研究却逐渐式微,走向低谷,似乎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等才是“高大上”,而研究人物则是“小儿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

的误区。当然这一问题另当别论,这里不作专门讨论,只是需要提及的是,当初正是对历史人物的浓烈兴趣把我带入历史学的神秘殿堂。我读大学时最喜欢的读物就有历史人物传记,先后读过邓广铭《岳飞传》、朱东润《陆游传》、沈起炜《文天祥》、弗雷德·库恩《康德传》等,发表的第一篇小论文也是关于历史人物与一本书的事,题为《郑思肖与〈心史〉》,刊登在北京《读书》杂志上。大三时对宋代人物特别是南宋川籍人物尤有兴趣,试着写了一些人物述评文章,却很少能够发表。虽然后来从业的历史地理学基本上排斥单一的研究历史人物生平、思想等(这实际上并非完全合理),但近年来国内历史人物学术会议邀请渐多,因此仍然陆续写了一些人物研究文章。本书的后半部分为“历史人物研究篇”,是在几个特殊的机缘下对张骞、诸葛亮、郑思肖、岳飞、苏轼、陆游与秦良玉的某些阶段性讨论,这些人物也大多与秦巴山地相关。此次将所能找到的人物研究文章收录入书。这倒并不完全是敝帚自珍,而是出于对历史人物研究的一往情深。

这批论文中岳飞研究相对较多,起因于从小就崇拜与深切同情这位悲剧性的民族英雄,且与人生求学经历中几次机缘相关。在岳飞研究中,最有意义、也最曲折最难忘的是《镇压杨么为岳飞“污点”说质疑》一文的写作与发表。写这篇论文时我还是一个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大三的青年学生。从何兹全先生主编的《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研读鼎澧逸民《杨么事迹考证》发现问题有感而发,经过整整一学期的搜集资料、数易其稿才完成的。由于文章对岳飞镇压杨么武装为生平“污点”的传统观点给予了基本否定,也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在民族战争时期的“破坏”作用予以了大胆的揭示,从而被认为是“文革”以后第一篇为岳飞镇压农民武装翻案并“质疑农民起义历史进步作用”的文章(基本观点已被收入朱瑞熙和程郁主编的总结20世纪宋史研究概况的《宋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此篇论文完成后曾分别寄给一些国内宋史名宿请教,结果有明确反对的、有石沉大海的、有虽然认可却建议不要发表的。上海的《中华文史论丛》本来已经来函决定要发表,最终仍出于某种顾虑作退稿处理,退回的稿件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朱笔修改文字。因此从大三一直拖延至毕业以后,迟迟难以发表。后来试投陕西省社科院《人文杂志》,出乎意料很快接到采用通知,论文发表于《人文杂志》1984年第6期。虽然有些心疼删改过甚,但陕西思想学术界在当时并非改革开放的前哨,《人文杂志》发表这篇

与主流史学观点冲突的文章无疑是要担当一定风险的。因此《人文杂志》与我有知遇之恩,多年以来我一直怀有感激之情。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过来的学人都知道,那时史学界农民战争史可是炙手可热的“五朵金花”之首,当时的史学名家不少即为“农战史”专家,有一地位颇高的著名“农战史”教授甚至在此前不久还发表文章高度评价“杨么起义”是上承黄巢起义下启李自成起义、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伟大农民起义”云云。在这样一种语境下,要发表观点近乎翻案的文章难度可想而知。然而,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史学界引起良好反响,《文摘报》《新华文摘》《光明日报》和人民大学学报复印资料等纷纷摘介或转载,此后大学中国通史教材与中学历史教材对岳飞“污点”说逐渐淡化甚至不提,或许与这篇文章发挥的“意外”作用有关。

1991年夏,海峡两岸首届宋史暨岳飞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我提交的试用历史心理学方法撰写的论文《论岳飞的性格、心态及悲剧》得到杭州大学徐规教授及台湾地区宋晞、王德毅、赵振绩等先生的肯定,激发了我研究岳飞人物的兴趣。1993年我争取到机会,来到杭州大学在徐规教授门下作访问学者,恰逢第二届海峡两岸宋史暨岳飞学术研讨会在西湖楼外楼宾馆举行,又承蒙徐先生鼓励写了一篇《岳飞与文天祥比较研究》论文在大会交流,后编入邓广铭、徐规主编的《岳飞研究》第四辑,由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此后几年又陆续撰写了《“岳飞学”构建的初步思考》(收入本书时改题为《关于民族英雄岳飞研究的十个问题》)、《近年来岳飞研究述评》等文章。前者是我于2013年应邀在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的演讲稿,后来发表在《南昌大学学报》。岳飞研究并没有坚持下来,近年来历史地理、历史文献类项目接踵而至,应接不暇,历史人物研究很难专门顾及。尽管如此,仍然因为应邀参会抽时间撰写了《诸葛亮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论略》《文同仕宦汉中时期的政治实践与心态》《略论苏轼、陆游巴蜀地理情结的差异与意义》《海南地理体验与苏轼晚年的文化心态》等几篇文章。虽然多为“应会”之作,但每篇文章也皆认真为之,查考资料、构想、修改完成,不敢马虎,毕竟“文章千古事”的古训言犹在耳。《海南地理体验与苏轼晚年的文化心态》是应海南大学邀请参加海口与儋州2018年“第3届东坡居儋文化思想研讨会暨第22届苏轼国际学术会议”论文,会上承蒙琼州《热带海洋学院学报》主编李景新先生垂青,特约索稿,发表在该学报上。而《略论苏轼、陆游巴蜀地理情结的差异与意义》则是应邀参加不久前在四川眉山举办的“2018眉山

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而赶在开学前夕完稿的。对苏轼这位宋代蜀籍文学大家,以前只是心里喜爱与崇敬,并未写过什么研究文章。今年通过应邀参加两次苏轼研讨会撰写论文,对苏轼这位“雄视百代”的文化巨人才有了近距离的考察与真切的认知。

书稿付印前夕零零散散写下这些“释读”说明,也算是对一二十年来自己区域文化与历史人物艰辛研究的一点回顾与感言。感谢博士生任柳和硕士生曾维英、乔福祥、刘冰涛等同学,是他们从大量学术期刊中搜集出我历年发表的相关论文并重新输入、校对,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姚虹云女士辛勤敬业、认真审校,修改了原稿中不少文字讹错,保证了此书高质量的出版,也特致感谢!书中的错谬与偏颇在所难免,愿与读者诸君交流切磋。

是为序。

2018年12月15日于重庆北碚

目 录

上 编 · 区域历史文化

- 论早期汉水上游与渭水流域的关系及意义 (2)
- 早期巴人的起源与迁徙新论 (9)
- 早期汉中盆地农业经济的开发 (18)
- 论宋元至明清汉中盆地农业经济的发展 (30)
- 蜀道文化述论 (40)
- 论蜀道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现状和拓展 (51)
- 蜀道及嘉陵江流域地方文献的特征和意义 (62)
- 蜀道线旅游资源的开发 (73)
- 关于黔中文化研究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 (81)
- 论唐宋黔中诗的历史地理意象及其意义 (92)
- 唐宋都城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以唐宋题咏长安及关中诗歌为中心的考察 (99)
- 唐代士大夫在开州的流贬、诗歌及意义
——以唐开州刺史韦处厚、唐次、崔泰之为主的考察 (113)
- 现代学术视域中的客家文化研究及其思考 (122)

| | |
|-----------------------------|-------|
| 论客家文化研究的历史地理学视角 | (131) |
| 秦巴山地三国文化资源的特点、价值与保护 | (139) |
| 重庆三国文化资源及其研究的几个问题 | (147) |
| 论北宋经略蜀地策略中的吏治 | (157) |
| 历史时期嘉陵江上游地区的商业贸易与市镇经济 | (166) |
| 乌江流域土司碑刻的史地学考察 | (176) |

下 编 · 历史人物研究

| | |
|-----------------------------|-------|
| 张骞通西域的社会心理因素及其影响 | (192) |
| 诸葛亮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论略 | (199) |
| 文同仕宦汉中时期的政治实践与心态 | (206) |
| 略论苏轼、陆游巴蜀地理情结的差异与意义 | (217) |
| 海南地理体验与苏轼晚年的文化心态 | (226) |
| 关于民族英雄岳飞研究的十个问题 | (237) |
| 镇压杨么为岳飞“污点”说质疑 | (248) |
| 论岳飞的性格、心态及悲剧 | (254) |
| 近年来岳飞研究述评 | (267) |
| 大陆地区岳飞研究述评（1988—2010） | (272) |
| 岳飞与文天祥比较研究 | (287) |
| 郑思肖与《心史》 | (301) |
| 中国传统女将文化视域下的秦良玉 | (304) |

附 录

- 《岳飞新论》跋 (316)
- 张承荣等主编《陇蜀古道——青泥道研究论文集》序 (319)
- 汉中的意义
- 孙启祥主编《文化汉中》序言 (325)
- 孙启祥著《蜀道与三国历史考论》序言 (328)
- 张昌畴著《开州人文史话》序言 (331)
- 马银行编著《〈鸿泥杂志〉点校与研究》序言 (334)
- 田孟礼著《古褒国与褒姒》评论 (338)

上 编

区域历史文化



论早期汉水上游与渭水流域的关系及意义

一 早期汉、渭之间的交通与炎、黄部落的北迁

汉水与渭水之间横亘险峻巍峨的秦岭,分别冲积出了古老的关中平原与汉江谷地,也孕育了悠久的渭水文化与汉水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早期的两个重要发祥区域,因特殊的地理交通意义,尽管交通艰险难行,但秦岭南北之间很早以前就有了交通往来。根据上古历史资料记载,炎、黄部落最早活动区域在关中平原、甘肃东部和秦岭以南陕南、四川等地。《路史》注引《春秋纬元命苞》云:“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字,人面龙颜,好耕,是为神农。”^①另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之女,曰昌仆,生高阳。”^②神农时期正是炎、黄部族形成时期,华阳之地,据《尚书·禹贡》载:“华阳、黑水惟梁州”^③,正是今陕南、四川地区。巴氏族也与炎帝部落有着亲缘关系,《华阳国志·巴志》载:“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治九州岛,为九囿……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④上古传说中人皇即炎帝神农氏。但据东汉王符《潜夫论·志氏》,巴人本为东夷太昊伏羲氏嬴姓后裔,似与常璩之说有出入,但炎帝神农氏与太昊伏羲氏都是同一时代

① [南宋]罗泌:《路史》卷12《后纪三》。

②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五帝本纪》。

③ 《尚书·禹贡》。

④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1。

人,二人所记或许各有所本。炎黄时巴人主要居住在汉水流域巴山南北,直到战国前期方东迁南移至巴东三峡地区,他们在汉水上游长期活动期间曾与商周时期的岐雍地区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殷墟甲骨文与周原甲骨文中都有“伐巴”“巴稟来贡”的记录就是证明。炎、黄部落北迁后,遗裔仍在陕南四川北繁衍,西周时被封为巴子国,因此《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亲族。”^①此外,汉水上游的氏、羌也与炎帝神农氏部落有密切的源流关系,甚至有炎帝即源出羌族的说法。杨东晨先生认为,“炎帝氏族在宝鸡发展、壮大后,向四方迁徙,沿渭水西迁入氏、羌地区者,逐渐成为其首领,故有炎帝生氏羌之载”^②。这种解释应是符合历史的合理诠释。到了黄帝后裔舜禹时代,汉水上游仍是黄帝部落活动的重要区域,《尚书·禹贡》即说大禹在汉水源头“番冢导漾,东流为汉”。今汉水上游汉中、安康一带仍有“妨墟”等数处“禹女”遗迹,也印证了黄帝部落在汉水上游活动的传说。大禹遗留在汉水上游的支族褒国,一直到西周末才亡国,著名美女褒姒即是其后裔。关于炎、黄部落早期活动区域,尽管文献记载扑朔迷离,但一般认为都与包括汉水上游在内的蜀地有密切关系,认为炎帝部落是从陕南进入关中渭水流域的。而黄帝部落在炎帝部落北迁关中后则长期活动于四川盆地,最后也逐渐迁于轩辕(陇)及陈(今宝鸡)一带,继而再东迁北移中原及华北平原,其迁徙路线都是沿嘉陵江翻越秦岭到达渭水流域。因此炎黄二部的形成与壮大与汉、渭间的交通都有关系。《尚书·禹贡》即有大禹治水“浮于潜、逾于汉、入于渭、乱于河”的记载,据学者研究这是古代汉、渭之间最早的水上交通记录。如果此记载无误,那么汉、渭之间至少早在夏代就已有先民探索通行。

二 汉水上游对以渭雍为政治中心的周秦王朝的重要作用

商周时期汉水上游是商周王朝控制西南巴蜀诸夷,以及由汉水东下征讨淮南夷的重要通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汉水上游城固、洋县渭水沿岸连续发现数处青铜器群,既与巴蜀商代青铜风格相似,又与关中商文化同类器皿纹饰风格有一定渊源关系^③。目前城固青铜器群的来源学术界尚未最后探明,但却表明汉、渭之间的人文交往可能比原先估计的要早得多。古代汉、渭之间有故道(也称陈仓道、嘉

①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2。

② 杨东晨:《陕南地区的古氏族》,载《古史论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③ 李伯谦:《城固青铜器群与巴蜀文化的关系》,《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

陵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四条翻越秦岭的栈道相通,而通行最早的则是由汉中西北沿嘉陵江谷地至宝鸡的故道。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周初的《散氏盘》铭文所记载的“周道”即后来司马迁《史记·河渠志》中的“故道”。如此则“故道”至迟应开辟于殷商,卜辞中多次记载的巴人朝贡及《尚书·牧誓》所载殷末西南蛮夷酋长赴周原参加周武王伐纣誓师大会走的就是此道。不过商周时期汉、渭之间的“故道”并非后来的栈道,而只是自然形成的嘉陵江谷道;西周时期汉中沿褒水河谷与斜水河谷通往岐、眉的褒斜道早期谷道也已形成。商末周武王伐纣曾有秦岭以南诸多部族北上岐地周原参加会盟誓师,《尚书·牧誓》所记的“庸、蜀、羌、鬲、微、卢、彭、濮”的八大部族除“微”在今眉县外,其余皆在秦岭以南汉水及四川盆地^①,其北上路线也只能是嘉陵江谷道。

西周尽管政治重心区域仍在黄河流域关中至中原、海岱一线,但从周文王时起政治版图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向秦岭以南汉水流域、西南蜀地及东南淮河流域开拓,即对所谓“南土”的开发。秦岭之南的汉水流域乃周王室的南部屏藩,周王室在周初即在汉水流域分封了众多的姬姓诸侯国,汉水上游据学者考证有巴、蜀、麇、西、骆、濮等^②,在汉水中下游则有楚、唐、邓、襄、随等方国,号称“汉阳诸姬”。西周前期为周室统治的巩固确实起到“捍蔽”作用。《诗经》中的“周南”“召南”诸多诗篇所涉地区大多在汉水上中游,其中以今汉中至湖北襄阳一线为主^③,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西周汉水流域人民生活及周礼对江汉流域的教化现象。但西周中后期,威胁周王室的反抗势力也主要来自汉水流域,汉水流域诸国已与周王朝产生日益严重的离心力。周昭王时汉水中下游楚国日益强盛,并与周王室分庭抗礼,已构成对周天子权威的严重挑战,昭王率师亲征,竟溺死于汉江波涛,周师大败而归。20世纪80年代在安康发现的《史密簋》约铸于共王、懿王时期,记录了西周东征南淮夷的一次战斗,是迄今为止在汉水上游发现的唯一西周青铜铭文,殊为珍贵。吴镇锋先生对此有缜密的考证^④。此外,西周中期曾在商末周初与周结盟的蜀也与周王室交恶,周原甲骨文有几件“伐蜀”“克蜀”的卜辞,据王晖先生考证其地为今四川及陕南一带^⑤。西周末期褒、巴不断反叛,给一山之隔的西周京畿造成威胁。《国

① 杨东晨:《陕南地区的古氏族》,《古史论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史记·周本纪》孔颖达疏注:庸、蜀、微、濮等八国“皆西南夷也”。但20世纪末关中国徽家族青铜器群的发现证明商周时微方国地望在秦岭以北今岐、眉一带。

③ 李星、刘昌安:《诗经别证》,汉中师范学院铅印本。

④ 吴镇锋:《安康出土史密簋考》,《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

⑤ 王晖:《周文王克商方略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